



1946—1949 年文协香港（港粤）分会考论

谢力哲

内容提要 1946年2月成立于广州并于同年夏迁至香港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文协）香港（港粤）分会，不仅是抗战后会员数量最多的文协分会，也是其唯一的海外分会。它积极利用位处英殖民地的特殊地缘条件，开展了大量形式多样的文艺工作，成为了当时文协旗下极为活跃、并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分支机构，起到了担负旅港文艺界统一战线主力的历史作用，为将“孤悬海外”的旅港左翼文化人纳入到与祖国内地同一脉搏的文艺运动进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关键词 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文协香港（港粤）分会；文艺统一战线

民国时期规模最大、影响至为深远的文艺工作者联合团体“文协”在香港的分支机构，可追溯至1939年3月26日成立的香港分会（后因1941年12月香港沦陷而停止活动）。香港学者指出，它是“本港第一个最具规模的现代文学团体”，是文协的重要分支^[1]。然而较之已为学界熟悉的抗战时期的文协香港分会，对于抗战结束至建国前先后活跃在穗港两地的文协香港（港粤）分会，今人却尚无足够的讨论，对它的来龙去脉及历史作用更缺乏较为全面的探析。本文即试图就此有所献芹，以期弥补既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未得到充分重视的一个段落，亦希望引起识者注意到1946—1949年间存在的香港（港粤）分会特殊的文学史意义。

一 在穗之文协港粤分会

抗战结束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自1945年“双十节”起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简称仍为“文协”），并于同年12月重新登记原香港分会会员。1946年年初，文协总会委托在广州的黄药眠、何家槐、韩北屏、章泯等人筹建港粤分会^[2]。继承战时香港分会而来的港粤分会得以顺利恢复，首先得益于战后大批左翼作家聚集广州，亦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推动。归中共南方局领导的特别支部1945年9月抵穗后，抓住战后

有利时机，促使国民党政府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赞助创办了《自由世界》《文艺生活》《文艺新闻》等左翼刊物，同时积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3]。羊城一度成为华南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心，无疑为港粤分会在此开展活动提供了便利。

1946年2月11日，文协港粤分会在穗召开第一次理事会议，并发表成立宣言。首届理事包括刘思慕、司马文森、周钢鸣、洪遵、章泯、杜宣、黄新波、陈残云、廖沫沙（怀湘）；候补理事有钟敬文、韩北屏、周行、芦荻、吕剑（未选出监事）。会上还给不久前受“较场口事件”冲击的郭沫若、李公朴等人发去慰问电^[4]。依照文协一贯的集体领导原则，港粤分会亦不选立主席。

成立宣言表示，在政协已经取得初步成就、和平建国即将开始、民主运动进入新阶段的今天，“我们居留港粤的文艺作家，感觉自己所负的任务异常重大”。这个任务，就是促进“民主”的潮流、壮大“反独裁”的声势。港粤分会立誓要“始终面向着人民，一直坚持着要成为人民的歌手”，为着扩大文艺队伍，“我们不拒绝与任何反独裁，求进步的作家合作”，更勉励“曾经在一条战线上战斗过来”的文艺界同仁“一定要肩并肩地继续战斗下去！”港粤分会还就当前国是发出呼吁：“必须于最短时间内实现成为一个包容各党派和无党派的社会贤达的民主政府。”这一吁请，与重庆政协会议期间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开放政权的敦促



是完全一致的^[5]。宣言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文艺主张，实质上乃是华南左翼文艺界的一次政治立场的集体表态，不仅向执政当局表达了不满与告诫，也宣示出“继续战斗”的决心。不久分会又在纪念“五四”文艺节的宣言中庄严宣誓：“我们愿以我们的笔贡献给我们祖国和人民，我们要把它锻炼成最有力的武器”，要“揭穿一切假装民主的面具，宣泄出最深沉的仇恨和愤怒的怒火”^[6]。

上述两份宣言十分鲜明地体现了文协港粤分会的“统一战线”属性：如其所言，它的使命，就是联合一切反对国民党专制的“求进步的作家”，如“人民的歌手”一样来代受压迫阶层立言、揭穿当局的反动行径、抨击独裁与官僚制度的罪恶。自然，港粤分会和其他在穗左翼文化团体势必将遭到当局的种种打压。1946年5月4日，国民党特务组织借“五四”纪念游行活动之机，出动暴徒毁损了广州兄弟图书公司和《华商报》广州分社、《正报》广州分销处和《大公报》分社。华商报门市部的书报、收入款项及设备悉遭破坏，兄弟图书公司的“楼上楼下存书，现款，设备，均被捣毁洗劫殆尽”^[7]。港粤分会随即发表《为“五四”事件宣言》，正告当局该行径早已“把一切伪装民主的面孔全都拆穿”^[8]。

同年6月5日，当局更借“未奉准登记”的名义，采取强硬手段没收了大批左翼书籍。港粤分会在给文协总会的函件中汇报了当日“广东省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会同社会局警察局人员，武装警察，便衣特务等百余，各于同一时间内出动，分头侵入全市各大小书店书摊”的情况，并指明此“实系广东国民党当局对华南民主文化变本加厉的摧残”。港粤分会特函请文协总会将其抗议声明报送各地分会、各国文艺作家与社团^[9]。6月18日，在港发行的统战报纸《华商报》发表了声讨暴行的《华南文艺作家告国际文艺作家书》，签名者二十余人，均为在穗之港粤分会会员^[10]。

正如广州杂志联谊会所揭露的那样，从“五四”到“六五”，在在表明了“政府当局对全国文化界的摧残，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11]。情势的恶化的确如其所言，6月29日广州市警局再次出动大批警员，以“未经登记”或“反动”为

由，一次性查封了包括《华商报》和《正报》驻广州办事处、《文艺新闻》社以及《文艺生活》《中国诗坛》《国民》《民主》等在内的13家文化机关和报刊。至此，华南的左翼舆论阵地几乎全被弹压了下去。

也正是在当日席卷全城的查禁风潮中，会址与《文艺生活》杂志社同在一栋楼中的文协港粤分会也被警方“勒令本会职员立即迁出，将本会办公室寝室钉闭”，在成立仅四月后便被迫停顿。虽横遭变故，分会在事后发表的声明中仍坚决表示“今后工作照常进行，决不因非法之封闭，稍行停顿，当仍本初衷，联合华南作家与反民主势力作坚决之斗争”^[12]。肩负着艰巨的使命，分会随即由穗迁港。国民党执意发动内战，使得港粤分会在其成立宣言中殷殷期盼的“和平建国”愿景转眼化作泡影，但这却不会阻碍他们在港期间继续以高涨的热情响应并配合国内的革命斗争。

二 分会迁港后的组织结构

如港粤分会1946年8月致文协总会函所述，自被广州警局查封后，“大部分会员络续来港，工作重心遂亦由粤转移”^[13]。华南左翼文化人为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亦纷纷就近向港九转移。同年8、9月间，撤至香港的周钢鸣、华嘉、司马文森、华嘉、陈残云组建了一个党小组（组长周钢鸣），临时负担起了分会的实际工作，并于当年秋季恢复了文协的活动。周钢鸣、司马文森、洪遹三人亦出任分会的常务理事^[14]。

1947年夏秋间，旅港左翼文坛的基本阵容大致集结完毕，在港恢复运作并已立稳脚跟的港粤分会遂于1947年9月更名为“香港分会”^[15]。由于旅港的左翼文艺工作者大都已加入文协，遂使其成为了当时港九、乃至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文艺社团，同时也是联络国内外各地文艺界并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力量。

文协香港（港粤）分会在港期间的理监事会经历过两次改选。1947年的年会选出的第二届理事有周钢鸣、洪遹、黄药眠、冯乃超、邵荃麟、司马文森、胡仲持、章泯、瞿白音、华嘉；候补



理事有廖沫沙、黄宁婴、夏衍。监事有：陈君葆、宋云彬、刘思慕；候补监事有邓初民、陈闲（冯培澜）、林焕平^[16]。改称香港分会后的1948年年会，决议扩大原组织，选出理事有茅盾、钟敬文、冯乃超（兼研究部）、黄药眠（兼组织部）、胡仲持（兼出版部）、周钢鸣（兼总务部）、洪适（兼秘书，以上为常务理事）、郭沫若、夏衍、邵荃麟、叶以群、华嘉、司马文森、周而复、黄宁婴；候补理事有黄宁婴、瞿白音、聂绀弩、陈残云、林林。监事有陈君葆（首席）、宋云彬、欧阳予倩、王任叔、刘思慕、邓初民、柳亚子；候补监事有楼适夷、顾仲彝、林默涵^[17]。夏衍、冯乃超二人为香港分会在文协总会的代表理事^[18]。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文代会）开幕在即，对文协未来的安排尚有待统一筹划，1949年的年会便决定暂不选出第四届理监事。

关于港分会的会员数，1946年8月迁港之初，仅有会员35人，次年增至51人。^[19]此后因内地和南洋文化人纷至沓来，分会成员亦随之迅速增加。1948年3月香港分会致文协总会函称：“目前集中香港之会员（包括原来是总会的会员和在香港加入本会的会员），总数已在九十五人以上”，其中常任会务工作者“为数在六十人左右”^[20]。茅盾于同年年会上亦称：“香港文协有会员九十余人，是文协各分会人数最多的一个”^[21]。之后一年间，部分成员开始陆续离港北返，至1949年5月时在港会员尚有74人。而香港分会之会员最多时，一度达130余人^[22]。

除专门负责处理、协调会务的理事会和组织、监督会员的监事会外，为推进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批评工作的开展，分会还专门设立有研究部，其下常设部门主要是方言文学研究会和儿童文学研究组。1947年初，港粤分会主办了一次“通俗文艺座谈会”，研究部随后设立“广东方言文艺研究组”，1948年的年会又决定将其扩充为“方言文学研究会”，会员近百人^[23]。后者是负责开展常态性的“华南方言文学运动”的部门，由钟敬文任会长，下设理论研究组、创作组、资料组、编辑组等部门^[24]。儿童文学研究组产生于1947年香港分会的年会上，是推动“华南儿童文学运动”的主力，

其不仅开展创作活动，也重视理论和批评，成员有黄庆云、胡明树、谢加因、吕志澄等。

密切联系和团结青年读者、积极发掘和培养青年作者，是文协的优良传统，“文通”（文协香港分会文艺通讯部）、“文联”（港九文艺青年联谊会）和“文生”（文艺生活社香港分社）就是文协在港扶持的三大群众性青年文艺团体。

文艺通讯部最初作为文协香港分会下属的青年团体于1939年8月成立，战后原“文通”成员陆续回到香港。港粤分会积极协助其复会，并指派总务负责人周钢鸣给予指导。1947年夏，“文通”正式复会，其组织活动主要有：“香港的一日”征文活动；发行《新青年文学丛刊》（共两辑）；定期组织会员学习和讨论党刊党报、阅读解放区文艺作品和开展文艺宣传等。先后参加理事会的有许戈阳、许南明、高建民、梁理夷、尹荣光（温江）等。1948年秋，在中共香港青委的指示和安排下与“秋风歌咏团”合并，到次年秋成员已达两百多人。1949年底港英政府宣布38个左翼团体为“非法”并勒令取缔，包括“秋风”在内的多个群众性组织遂逐步停止活动^[25]。

港九文艺青年联谊会由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第四届同学的文艺学习小组发展而来，旨在吸收社会上的进步青年，筹备初期的会员有40余人。同年10月，港九文联召开成立大会，周钢鸣、司马文森、洪适、黄药眠、陈残云等人均莅临指导，干事会成员有陈君卓、郑必达、陈叔健、欧耀煌、叶有秋等。“文联”主要的组织形式是读书小组，并开办文艺讲习班，邀请到夏衍、黄药眠、周钢鸣、胡仲持、司马文森等作家授课。“文联”积极动员海外青年投身国内民主运动，以达到“教育青年、团结青年”的目的。到1947年秋，“文联”发展到近二百人，规模已十分可观^[26]。

1947年1月成立的“文生社”是文协香港分会会刊《文艺生活》杂志的读者组织，香港分社的负责人为司马文森、张殊明、陈残云，此外还在菲律宾、吉隆坡、泰国、新加坡设有分社。学习小组是其主要的活动形式。“文生”组建有一个由十余位旅港著名作家组成的旨在为青年读者解惑答疑的顾问会，还举办了多次“文艺月会”讲座^[27]。在



文协的大力支持下，其社员运动得到了港粤和南洋青年的热烈响应，到 1949 年 5 月，加入文生社的社员已有约 1500 人，仅香港分社在 1949 年初的社员就多达 700 余人^[28]。

1947 年秋，经上级决定，“文通”“文联”“文生”由文运系统转到青运系统，归中共香港青委直接领导，业务上仍由文协香港分会负责指导。1948 年底至 1949 年初，因应内地革命形势急速发展的迫切需要，“三文”将大批从事文化与宣传工作的干部输送到了解放区，履行了其应尽的使命。

三 分会在港主办的各项活动

（一）编辑出版分会会刊

文协港粤分会最初的会刊是《港粤文协》（1946 年 3—5 月），由港粤两地作家联合组织发行，编委会由严杰人、芦荻、楼栖等组成，借《正报》（在港发行之党刊）《华商报》和《人民报》（农工民主党机关报）的副刊版面轮流刊出，每月出版 6 期（各报分别出两期）。《正报》侧重刊发文艺活动报导，《华商报》多发表理论与文艺批评，《人民报》以登载短篇创作与杂文为主^[29]。迁港后于 1946 年 9、12 月发行了两辑《文艺丛刊》（周钢鸣主编，新民主出版社出版）。该刊经费全赖“南洋侨胞募集少许资金”，但却“仅够两期之费用”，终因缺乏后续支持而夭折^[30]。1947 年 6 月又利用《华商报》文艺副刊的版面发行了“港粤文协”副刊（半月刊，洪遵主编），共出 9 期^[31]。

香港（港粤）分会在港期间最主要的期刊平台，是大型文学杂志《文艺生活》。1946 年 8 月，此刊自穗迁港复刊，主编司马文森和陈残云都参与了恢复文协在港活动的工作。依照中共香港文委的决定，以《文艺生活》作为分会的机关刊物^[32]。该刊在香港一直延续到 1949 年 12 月（共 28 期），刊载了大批会员的创作和评论，并以大量篇幅报道和宣传了文协主办的各类活动，亦为旅港文艺界的主要阵地之一。^[33]

此外，分会为反对内战、呼吁和平并声讨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曾多次发表电讯，竭力仗义执言。如电唁慰问闻一多、李公朴的家属；抗

议广州“五四”“六五”暴行；向郭沫若拒绝参加“国民大会”的行为致敬；声援国统区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呼吁营救被关押在东北的骆宾基；谴责荷属印尼殖民当局逮捕作家王任叔等。

（二）年会暨“五四”文艺节晚会

自 1945 年 5 月 4 日在重庆举行了首届文艺节纪念会后，“五四”文艺节遂成为文协每年固定的庆祝项目，也是全国文艺工作者的重要节日。分会在港连续三年（1947—1949）于“五四”当天举行的年会暨文艺节纪念晚会，可谓旅港文艺界每年的“重头戏”。年会的主要目的在于检讨一年来的会务并规划来年的工作重点，晚会则是南下文艺工作者一年一度的共祝佳节、开展交流、增进友谊的大联欢。

1947 年 5 月 4 日下午，港粤分会在六国饭店召开复会周年庆暨第二届年会，大会主席黄药眠致开幕词后，与会全体向因献身抗战及民主事业而牺牲的会员默哀致敬。司马文森作有关会务的报告，时任民盟中央委员邓初民和香港知名学者陈君葆先后发表讲话。会议通过了八项提案，包括举办暑期文艺讲习班和暑期文艺竞赛、建立文艺图书馆、开办文艺学院或文艺讲座、设立儿童文学研究会等。当晚，港粤分会联合港九戏剧协会和香港歌咏协进会，在铜锣湾孔圣讲堂办了一场热闹的“五四”同乐晚会，邀请到邓初民发表演讲，并有虹虹歌唱团、建国剧社、中原剧艺社表演的歌咏、诗朗诵、话剧等节目^[34]。分会在其“献言”中表示，在内战烽火正炽的“逆流的日子”纪念“五四”，“令我们更深深的感到人民的悲痛，和时代所课与我们的战斗任务，更加紧迫更加沉重。”他们提出三件事来与全国文艺界同仁共勉：一是扩大新文艺的阵容；二是加强自我改造，向人民学习、与人民密切结合；三是文艺工作者相互间更需团结。总之，“只有积极地肩负起为和平民主而奋斗的重任，才是我们今天纪念文艺节的真实意义！”^[35]

次年为了庆贺五四文艺节、文协成立十周年和香港分会复会二周年的“三喜临门”，主办方特意扩大纪念活动。第三届年会于 1948 年“五四”当日下午如期在六国饭店召开，到会者 70 余人。



大会主席黄药眠致词时特别肯定“过去一年是文协香港分会阵容最盛的一年”，周钢鸣作为总务部负责人报告一年来的会务，郭沫若、茅盾、聂绀弩、钟敬文、宋云彬等人也相继发言。大会议决的主要事项有举办本年度青年文艺创作竞赛；扩大“方言文学”运动，成立方言文艺研究会；加强与南洋文艺界之联系等。文艺节庆祝会亦于当晚在孔圣堂举行，现场涌入千余名观众，可谓一时之盛况。晚会先由郭沫若、茅盾、陈君葆、欧阳予倩发表讲话，接着是方言歌咏等游艺节目以及建国剧艺社演出的讽刺话剧《2+2=5》（瞿白音作）。七点开幕的晚会一直持续到十一点半才散场，与会者的兴致之高昂可见一斑^[36]。

此届年会还决议函电上海文协总会并转告国内文艺界，互祝共勉“要在人民得到彻底胜利的过程中，使我们新文艺能有决定性的贡献”^[37]。当日发表的由郭沫若、茅盾领衔，与另62位在港文艺工作者共同署名的《纪念五四致国内文化界同仁书》，可称旅港文艺界阵容最为庞大的一次集体发声。面对日新月异的革命形势，他们既惭愧置身海外“不能和你们同甘共苦，共同奋斗”，又坚定地表示“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在今后斗争的道路上“要效法着你们”，并号召一道来“争取‘五四’精神的普遍而永恒的胜利！”^[38]

1949年5月4日，香港分会第四届、也是最后一届年会继续在六国饭店举行，参会者近百人，其中会员50余人。虽然夏衍、郭沫若、茅盾等多位重要作家此时已离港北返，但受到全面胜利日益临近的感召，会场上依旧洋溢着热烈的气氛：“近百个文艺工作者，高高举起了杯子，欢呼着胜利和解放，更为未来的幸福而祝福。”大会主席黄药眠在开幕词中表示：“我们在国内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和压迫，不得已逃到这里来的，现在看到了新政权就快取得全面胜利，我们也可以回到故乡去了，那种愉快，真是不可比拟的。”李达、沈起予、吕荧、聂绀弩、骆宾基等到场发表演说，阐扬“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年会还修订通过了提交给第一次文代会（彼时多称“文工大会”）的五项提案，包括设置群众文学运动委员会、发展方言文学、设置文艺奖金、加强文协总会出版部的工作和

加设儿童文学研究部门等。^[39]

当晚纪念“五四”三十周年的联欢会仍被文协安排在孔圣堂举办，现场人声鼎沸，到场千余人，礼堂的走廊过道皆人满为患。开会前全体合唱《五四纪念歌》，继而由陈君葆作简短演讲，他表示：“今天庆祝‘五·四’文艺节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的国家将真正的属于人民大众的了”。建国剧艺社与中原剧艺社联袂献上了讽刺蒋家王朝没落的独幕剧《南下列车》（瞿白音作）、借鉴新秧歌形式的改良广东方言剧《夫妻识字》、西北民谚歌剧《马车夫之恋》和歌咏、舞蹈等节目，到十余时方散场^[40]。

建国前夕的这次文艺节庆祝活动，正值旅港文化人纷纷北返之际，因此也就成了文协香港分会举办的最后一次盛会。伴随中国共产党不断加速夺取全国政权的步伐，留港会员也陆续奔赴解放区，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战后的香港左翼文艺热潮也随之告一段落。就这个层面来看，1949年的年会暨“五四”纪念会也具有了预示香港分会、乃至整个旅港左翼文坛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特殊意味。

（三）举办青年文艺创作竞赛

培养文艺新军、团结青年作者，是文协自抗战以来一贯重视的工作任务。为鼓励新人新作和发掘华南及南洋的青年作家，港粤分会依照其1947年第二届年会的决议于同年暑期发起了“青年文艺创作竞赛”活动。到12月截止时共收到94篇稿件，评审基于“生活知识较丰富，人物描写较完整，事件较有强烈抗议性质”的标准选出了7篇获奖作品，《文艺生活》海外版第1、2期以专号的形式刊登了入选的优秀作品。分会则在总结报告中指出，来稿最大的缺点在于作者“对农民或工人都不很熟悉，写不出他们的生活感情；相反的，对旧社会的小人物，却写得比较的成功”，这说明今后必须要走“认真地努力去跟人民结合，向人们学习的最重要的方向”^[41]。显然，激发青年作者自觉践行“工农兵方向”的意识、加强其对《讲话》精神的深切领会，是分会举办创作竞赛的核心诉求，也充分体现了旅港文艺界致力于在海外配合贯彻解放区文艺政策的时代使命。

周钢鸣在次年总结会务时，特意把“举行青



年文艺创作竞赛，成绩甚佳”作为报告的要点之一，于是该届年会通过了“继续举办青年文艺创作竞赛”的提案^[42]。香港分会接着举办了1948、1949年的青年创作竞赛，也都收获了热烈的反响，为推进华南文艺新生力量的茁长发挥了积极作用。基于连续主办创作竞赛的成功经验，香港分会更将之视为一项成效显著、并值得推广到全国的工作，其在报送文代会的提案中就有“拟文艺奖金奖励办法”一案：他们建议由全国文协设置评委会，每年选出各体裁的优秀文艺作品并给予奖金；同时“各地文协分会，按年度举办‘青年文艺创作竞赛’广泛征求青年作家投稿参加竞赛”，还拟出了具体的评审方案^[43]。

（四）推动群众性文艺工作

“请文协总会设置群众文学运动委员会或群众文学顾问等机构，执行发动群众组织”^[44]，不仅是香港分会拟提交文代会的议案之一，也可从中窥知前者对于发展“群众文学”的重视程度。分会立足港九的实际情况，做了不少群众性文艺工作，主要形式包括创办文艺学院、建立进修图书馆、举行文艺讲座等。

为帮助香港和南洋的知识青年提高对进步文艺的认知水平，1947年初，司马文森、陈残云和周钢鸣以文协的名义主办了一个只设函授科的“文艺学院”，学员一度达百余人，但终因经费短缺，不到半年即停办^[45]。为了给港九贫寒青年提供一个学习、进修的场所，香港分会又于1947年10月建立了一座“进修图书馆”，并指派陈残云负责监督。馆址设置在九龙弥敦道的南国书店，该书店是由中共香港地下党员司徒坚、王蔚然、芦苇等人创办和经营的文化联络站，藏书约有三千余册，大部分是文艺类书籍，皆由文协从各方面征集而来。1948年3月至次年3月期间的读者平均每月在350人左右，长期借阅的读者平均每月有约200人^[46]。出于“文协内部学习，和文协有关的一些文艺青年团体学习之用”的目的，分会还在1948年3月间举办了“春季文艺讲座”，邀集了多位旅港著名文化人出席，包括郭沫若、茅盾、楼适夷、叶以群等^[47]。

（五）组织旅港文艺界交流联谊

香港（港粤）分会作为彼时华南最重要的文

艺界统一战线组织，自然也担负起了促进旅港文化人联谊交往的职能。除“文艺节”之外，“诗人节”也是文协的重要节庆。为表效法屈原的精神、“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文协自1941年起便将每年的端午节设立为诗人节^[48]。从1947到1949年，分会在港接连三年举办诗人节纪念活动，前两次都发表了宣言文字，可视作旅港左翼诗坛的时局声明，亦能从中体察其对于诗人之角色与任务的定位。

1947年端午节（6月23日），多位作家、诗人、戏剧工作者相聚在六国饭店的一楼礼堂举行茶话会。黄药眠在致辞中表示，要学习屈原为国家民族献身的优良精神，“我们要改造自己，向人民学习。”周钢鸣报告了十年来的诗歌运动，指出知识分子出身的诗人正在努力向前发展和变革的过程中。陈君葆、冯乃超、黄宁婴等也先后发言，余兴节目有芦荻等人诗朗诵和李门的唱龙舟表演等^[49]。会后，黄药眠、冯乃超、吕剑、陈残云、黄宁婴、芦荻、楼栖、符公望、廖沫沙、周钢鸣、华嘉、秦似、许戈阳等人联名发表了《诗人节宣言》，宣告在这“大的震撼，大的澎湃的时代”里，“我们的诗，必要记录这大的震撼的主题，大的澎湃的音节，讴歌这巨大的前进的潮流”^[50]。次年的诗人节又发表了由郭沫若、柳亚子领衔，与二十余位旅港诗人共同署名的《我们的话》，他们号召诗人在“大解放的黎明”时刻，不仅要带着“他的歌唱”、也要带着“为人民服务的点滴实际工作，来共同创造人民大解放的史诗”^[51]。1949年的诗人节虽未发表宣言，但分会仍邀集了多位会员及眷属在九龙沙滩上举行联欢会^[52]。

文协在港连续举办的活动，还有1946至1948年每年在十月间举行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出席者多为文化名流，参会人数达百余。席上除发表阐扬鲁迅精神的演说之外，还伴有朗诵、歌咏、戏剧等节目。至于其他各项聚会，则次数频繁、形式不一。据统计（除前文已提及者），仅1948—1949年举办的主要活动就有1948年1月5日的欢迎来港文化人新年团聚会（到会者三百余人，茅盾称之为继1941年后“全国的文化人在香港的又一次大聚会”^[53]）、5月16日的欧阳予倩六十寿辰暨参加



戏剧工作四十年庆祝会、9月12日的朱自清追悼会、1949年2月3日的春节联欢大会、4月10日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座谈会，还有招待内地新近抵港作家的历次欢迎茶会等。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开春在九龙塘小学举行的春节联欢，因“国内的解放，鼓舞了人心，在会场里只听到一片嘻嘻哈哈的爽朗笑声”^[54]。到场会员及其眷属达260余人，“为从一九四八年以来文艺界最大的一次盛会。”黄药眠代表文协致辞欢迎来港的叶圣陶、蔡楚生、端木蕻良、臧克家、卞之琳等人，各出席者亦分别发表讲话，席间由中国歌舞剧艺社献上的表演更增添了新春的喜庆气氛^[55]。

四 旅港文艺界的统战主力： 文协香港（港粤）分会的历史作用

文坛旗帜人物云集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港粤）分会，不仅是战后会员数量最多的文协分会，也是其唯一的海外分会。因其位处英殖民地的特殊地缘条件，相比国统区的上海总会和南京、重庆、成都、北平、桂林等分会，港分会显然有着更多的自由活动空间。他们也积极利用这一客观优势，组织开展了大量工作，使其成为了文协旗下极为活跃、并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分支机构。

它在文协整体中的重要地位，从经费的分配上即可见一斑。1946年底文协总会预备拨付各分会的工作费中，以港粤分会所得最多（60万元）^[56]。1948年春文协总会在分配美国笔会的捐款时，决定“本会与港分会各十分之四，其余十分之二”^[57]。香港分会所得之份额与上海总会相等，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无怪乎茅盾在1948年的年会上要将其与抗战时期的重庆文协总会相提并论：“是文协各分会人数最多的一个，当年在重庆，也不过如此”^[58]。时人甚至认为：“包括权威的老作家和优秀的青年作家多人”的香港分会“是代替了上海的总会的地位的”^[59]。

诚如旅港作家陈残云所说：文协“在香港文艺界中树立了威望，成为南中国一支革命的战斗的旗帜”^[60]。又如旅港诗人黄宁婴所言：这“是一个广泛团结进步文化人的群众组织。解放战争期

间，在团结进步文化人士、宣传我党的革命主张，起了很大的作用”，是在中共香港文委领导下的“文艺界统战组织”^[61]。简言之，作为旅港文艺界的统战主力来“联合华南作家与反民主势力作坚决之斗争”^[62]，就是文协香港（港粤）分会所起到的主要历史作用。它通过联合、凝聚大批因内地战事而撤至香港的左翼文化人，使他们团结在同一面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旗帜下，发挥了文艺战线配合革命斗争的效力；它通过组织策划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且卓有成效的各项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左翼文艺运动在港九地区的蓬勃发展，为战后的革命文化宣传开辟出了一片新局面。要之，将“孤悬海外”的旅港左翼文化人纳入到与祖国内地同一脉搏的文艺运动进程中，分会可谓功不可没。

港分会虽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但仍属于志趣立场相近的文艺工作者自由结合的团体，并不能将其完全等同于党组织机关，不过其“文艺统一战线”的属性仍难免令它成为执政当局的眼中钉。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中央周刊》即在1948年8月诋毁文协“自迁港后，已完全变质，公开宣称接受共匪领导，奉行‘毛泽东文艺路线’”，已然“落入共匪文化特务所掌握”^[63]。香港分会随即公开反驳称：“文协为作家自由自愿的组织，包括各党派及无党派的作家，邵力子先生亦为总会的理事，中央周刊说该会为共匪特务所掌握实属诽谤污蔑。”^[64]况且“会员之有无党籍与港分会之为作家同业组合，乃截然两件事”，诬陷文协落入“文化特务”之手，不啻“白日梦呓，实属无稽”^[65]。国民党舆论炮制的谣言，一方面暴露了前者一贯不择手段的文化“剿共”伎俩；另一方面也恰从反面印证了港分会在反抗专制、争取民主的文艺战线上的杰出表现。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号召迅速召开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后，旅港的各级干部、民主党派与文化人士就开始陆续踏上了返回解放区的归途，其中自然也包为数众多的文协会员。从该年8月至次年8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分二十批安全护送了民主、文化人士及其他人员一千多人北上。北平文代会召开前夕，文协香港分会“推派代表，携带提案多件，兼程前往



参加”。全国文艺工作者胜利会师在即，分会特于 1949 年 5 月 21 日发出贺电：

全国文工大会于今日开幕，实为革命文艺进军三十年之伟大胜利。本会同人衷心愉快，特向全体代表们致敬。此次大会，检阅力量，意义重大。务希检讨过去，策励将来。本会期待大会有所指示，以求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领导下，继续加紧努力，谨电驰贺，预祝成功。^[66]

第一次文代会落幕之后，新政权的文艺体制被迅速建立了起来，作为大会发起团体之一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也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成立而被纳入到新的编制中，香港分会亦随之自动解散，圆满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1] 卢玮銮：《“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一九三八—一九四一）组织及活动》，《香港文学》第 23 期，1986 年 11 月。

[2] 《全国文协港粤分会成立》，《华商报》，1946 年 2 月 15 日。

[3]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广州党史纪事 1919.5—2006.12》，第 115 页，广州出版社 2008 年版。

[4] 《文协港粤分会成立》，《文艺新闻》第 2 号，1946 年 2 月 16 日。

[5] 《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港粤分会成立宣告》，《文艺生活》光复版第 3 号，1946 年 3 月 1 日。

[6] 《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港粤分会为“五四”第二届文艺节纪念宣言》，《文艺新闻》1946 年第 7 号。

[7] 《广州特务逞凶 捣毁本报分社》，《华商报》，1946 年 5 月 6 日。

[8] 《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港粤分会为“五四”事件宣言》，《民主》南方版第 9 期，1946 年 5 月 11 日。

[9] 《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港粤分会抗议广州“六五”暴行》，《华商报》，1946 年 6 月 11 日；《文协港粤分会致总会函（1946 年 6 月 7 日）》，《上海鲁迅研究》2005 年第 4 期。

[10] 《华南文艺作家告国际文艺作家书》，《华商报》，1946 年 6 月 18 日。

[11] 广州杂志联谊会：《我们的抗议》，《联合增刊》第 4 期，1946 年 6 月 15 日。

[12][62] 《为当局查封书店遭株连 港粤文协发表声明》，

《华商报》1946 年 7 月 2 日。

[13][30] 《文协港粤分会致总会函（1946 年 8 月 30 日）》，《上海鲁迅研究》2005 年第 4 期。

[14][32] 何楚熊：《陈残云评传》，第 248—249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 年版。

[15] 范泉：《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第 121 页，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3 年版。

[16] 《文艺界热烈庆祝文艺节 发展港粤文艺工作》，《华商报》，1947 年 5 月 5 日。

[17][36] 林焕平：《文艺节在香港》，《展望》第 2 卷第 3 期，1948 年 5 月 15 日；《本港两个文艺团体昨日分别纪念五四》，香港《大公报》，1948 年 5 月 5 日；《港九文艺界阵容鼎盛 昨热烈庆祝文艺节》，《华商报》，1948 年 5 月 5 日。

[18] 《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第九届年会当选理监事名单》，《上海鲁迅研究》2005 年第 4 期。

[19] 会员名单详见《文协港粤分会致总会函（1946 年 8 月 30 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三十六年度选举名单》，《上海鲁迅研究》2005 年第 4 期。

[20] 《文协香港分会致总会函（1948 年 3 月 21 日）》，《上海鲁迅研究》2005 年第 4 期。

[21][42][58] 林焕平：《文艺节在香港》，《展望》第 2 卷第 3 期。

[22][24][46] 《一九四八年度全年会务概况》，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编印：《文艺三十年》，第 110 页，第 110—111 页，第 111—112 页，1949 年 5 月。

[23] 静闻（钟敬文）：《华南方言文学运动的现状和意义》，香港《大公报》，1949 年 5 月 4 日。

[25] 文通学社编：《历史的轨迹》，第 2—22 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26] 《港九文艺青年联谊会主办文艺讲习班》，《华商报》，1946 年 10 月 30 日；叶有秋：《总是要放射的》，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校友会编印：《今昔依依》，第 45—48 页，1988 年。

[27] 郭沫若和茅盾在“文艺月会”上的演讲记录，分别见陈雅记录：《文艺活动的总方向》，《文艺生活副刊》海外版第 2 期，1948 年 3 月；文华记录：《文艺与生活》，《文艺生活副刊》海外版第 3 期，1948 年 5 月。

[28] 杨益群等编：《司马文森研究资料汇编》，第 53—54 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何楚熊：《陈残云评传》，第 264—268 页。



[29] 钟紫:《战后香港第一家党报——〈正报〉》,《新闻研究资料》1982年第2期;杨奇:《粤港飞鸿踏雪泥:杨奇办报文选》,第31—32页,羊城晚报出版社2008年版。

[31] 吕剑:《香港〈华商报〉往事琐忆》,《吕剑诗文别集》,第102页,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3] 参见雷蕾:《司马文森和〈文艺生活〉》,《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2期;王丹:《港版〈文艺生活〉月刊与战后香港文学》,《学术研究》2014年第9期。

[34] 《文艺界热烈庆祝文艺节》,《华商报》,1947年5月5日。

[35] 《中华文协港粤分会纪念文艺节献言》,《华商报》,1947年5月5日。

[37] 《港九文艺界阵容鼎盛 昨热烈庆祝文艺节》,《华商报》,1948年5月5日。

[38] 郭沫若等:《纪念五四致国内文化界同仁书》,《华商报》,1948年5月4日。

[39] 《文协昨举行年会》,香港《文汇报》,1949年5月5日;《中华文协港分会热烈庆祝文艺节》,香港《大公报》,1949年5月5日;《文协香港分会昨开年会》,《华商报》1949年5月5日。

[40] 《纪念“五四”文协举行文艺晚会》,香港《大公报》,1949年5月4日;《孔圣堂文艺晚会》,香港《文汇报》,1949年5月5日。

[41] 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青年文艺创作竞赛结束报告》,《文艺生活》海外版第1期,1948年2月。

[43] 《“为人民服务”文协向全国文代献旗》,香港《文汇报》,1949年5月5日。

[44] 《中华文协港分会热烈庆祝文艺节》,香港《大公报》,1949年5月5日。

[45] 华嘉:《香港人间书屋二三事》,《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何楚熊:《陈残云评传》,第264页。

[47] 《春节文艺讲座》,香港《星期报》,1948年3月7日;《文化短讯》,《国讯》第454期,1948年3月19日。

[48]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诗人节缘起》,文天行等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资料汇编》,第312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

[49] 《诗人节 诗人一盛会》,《华商报》,1947年6月24日。

[50] 黄药眠等:《诗人节宣言》,《华商报》,1947年6月23日。

[51] 郭沫若等:《我们的话——纪念诗人节》,《华商报》,1948年6月11日。

[52] 《诗人令节宜远足》,《华商报》,1949年6月1日;《锣鼓声中度端午》,香港《大公报》,1949年6月2日。

[53]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第4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54] 《迎接春天来临 作家昨日联欢》,香港《文汇报》,1949年2月4日。

[55] 《文艺新闻》,《文艺生活》海外版第10、11期合刊,1949年2月15日。

[56] 《总会调拨各分会经费征求意见函(1946年11月)》,《上海鲁迅研究》2005年第4期。其余拨款分配为北平分会50万元、重庆分会50万元、成都分会30万元、桂林分会20万元。

[57] 《文协总会致香港分会理事会(1948年春)》,《上海鲁迅研究》2005年第4期。

[59] 欧阳春:《文化人在香港》,《中建》北平版第1卷第8期,1948年11月5日。

[60] 陈残云:《忘不了的歌声——悼念钢鸣同志》,《陈残云文集》第8卷,第348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61] 黄宁婴:《〈中国诗坛〉杂忆》,《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63] 《中华全国文协完全变质》,《中央周刊》第10卷第34期,1948年8月22日。

[64] 《艺文短讯》,《燕京新闻》第15卷第18期,1948年10月25日。

[65] 《文化广播》,《展望》第3卷第2期,1948年11月13日。

[66] 《文艺战士毛笔赴平》,香港《大公报》,1949年5月22日。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何吉贤